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

蔡建刚^①

(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 湖南张家界 427000)

摘要:“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将统领乡村旅游发展和脱贫攻坚事业。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乡村旅游在促进地方就业和收入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贫困率下降、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内在逻辑涉及因果逻辑、主体逻辑、实施逻辑三个方面,在实践中要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以及规范理念和产业思维。以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为抓手,助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一是要精准规划乡村振兴方案和市场营销方案,创新利益分配机制;二是要精准识别客源市场和贫困农户,提升地方经济效益;三是要精准开发特色商品和“三农”人才,培育持续竞争优势。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脱贫攻坚;资源诅咒

一、引言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和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到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即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下简称《意见》),再到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词和主旋律,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寻求工作突破口的焦点和重点,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武陵山片区企业参与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绩效提升机制研究”(编号:71663018)。

作者简介:蔡建刚(1984—),男,浙江诸暨人,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区域发展、产业组织与理论。

已经成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希望和新动能。中国知网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共发表题目涉及“乡村振兴”的文章10900篇。其中,2017年10月18日以后发表的文章有10895篇,占99.95%;期刊论文2598篇,占23.83%,且主要集中在2018年上半年,共有2280篇,占期刊论文总数的87.76%。由此可以看出:(1)“乡村振兴”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社会媒体的重要研究领域和重点关注对象,体现出极强的“时政性”,而且这种研究与关注热度还将持续。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服务于国家战略和方针政策,服务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于人民大众和民生事业;反之,国家战略和政策也要引领科学研究,体现出战略性、导向性和前瞻性。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战略和政策都能引领研究、得到认可、产生共鸣。乡村振兴战略一经提出便引起全民热议、引发研究热潮,表明该战略不仅顺应民心、民意和民愿,还符合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2)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章以媒体报道为主,期刊论文相对较少,论文的学术性和规范性不强。中国知网数据显示,现有的题目涉及“乡村振兴”的报纸文章数量占比接近80%,硕博学位论文仅有1篇(叶奇奇,2018),研究色彩和学术性并不强。从内容来看,更多的文章将乡村振兴战略当作一种研究背景或视角,如詹国辉等(2017)、张艺颖(2018)、索晓霞(2018)等;另外的文章又多为解读性或表态性文章(姜长云,2018),如李铜山(2017)、王立胜等(2018)等;一些涉及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与脱贫扶贫的文章,又多为描述性文章,不仅缺乏规范的案例分析或实证分析,还缺乏相互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致使研究结论的主观性较强,乡村振兴的特殊要求没有得到很好体现,如朱建江(2017)、徐虹等(2018)等。但可以预见及肯定的是,今后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研究方法将更加规范、更加多元。

可以说,我国乡村研究已经步入全新的时代。虽然乡村发展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以往更多地聚焦于“三农”问题(刘可焜等,2003;韩俊,2013)、美丽乡村建设(和沁,2013;王文龙,2016)以及城乡一体化(罗来军等,2014;魏后凯,2016)等,从未从战略的视角或高度来探讨乡村振兴问题。“乡村振兴

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意味着乡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更高，得到重视的程度更大、政策支持更多。乡村振兴将统领农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事业，并对其提出更多、更新、更高的要求。

本文以乡村旅游为切入点，通过乡村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梳理，探讨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的内在逻辑，从而提出通过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对策建议，以期对乡村振兴战略更好更快的实施提供经验参考和政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乡村旅游与经济增长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以及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部分，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所普遍接受（Fleischer et al., 2000；Perales, 2002；Hjalager et al., 2018）。同时，将乡村旅游视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动力与抓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共识（朱建江, 2017；周璐, 2018）。然而，学术界对于乡村旅游发展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认知却褒贬不一，几乎每一个支持发展乡村旅游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由背后都有一个反对的理由（Fleischer et al., 2000），因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每一个收益都有相应的成本（Frederick, 1993）。对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经济增长”的内涵或指标进行科学界定。过去数十年，有关农村经济增长的文献大都在探讨人口、就业、收入等传统的数量型增长指标（Marcouiller et al., 2004；Kimet et al., 2005；Leatherman et al., 1999），对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等增长质量问题涉及较少。任保平（2013）指出，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是经济增长理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数量型增长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质量型增长是在数量增长基础上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因此，仅考虑农村经济增长的数量或速度，不足以全面、客观地评价乡村旅游的地位和价值。基于此，本文将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梳理乡村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乡村旅游与数量型经济增长

乡村旅游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型指标主要体现在促进地方就业和收入增长两个方面(Greffe ,1994 ;Echter ,1995 ;Fleischer et al. ,2000)。由于旅游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这些工作与那些受教育或受培训较少的农村居民来说是非常契合的，因此乡村旅游能够带动就业(李德明等，2005)。English et al.(2000)、Wagner (1997) 等的研究还指出，那些高度依赖旅游与休闲业，并将其视为重要就业来源的农村地区有比其他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更快的趋势。然而，与旅游和休闲相关的工作往往是无出路、低技能、低回报、季节性的，从业人员往往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burger-flinppers)，属低报酬职务工作的人员(Frederick ,1993 ;Lewis et al. ,2003 ;Marcouiller et al. , 2004)。Frederick (1993) 还指出，乡村旅游创造的低质量工作(low-quality jobs)不足以帮助工人特别是妇女脱离几乎是牢不可破的贫困循环(unbreakable cycle of poverty)。

在收入增长方面，乡村旅游促进农民收益的增进作用是显著的。姚海琴等(2016)的研究表明，农户从事乡村旅游对提高其收入水平的效果十分明显，且随着从业年份的增加，乡村旅游对农户的增收效果越大，反映出良好的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乡村旅游支出的地方收入又总是在地方消费，从而带来更多的地方收入，而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只能创造较少的直接和间接利益(Frederick , 1993)。但是，农民从乡村旅游发展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有差异的(杨启智等，2012；周荣华等，2012)。特别是当农民被排除在乡村旅游之外，或者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很低时，其无法甚至根本不能从中获益，且大量的旅游利益被外来经营者攫取(曹端波，2007)，这样就导致富人对“穷人”的剥削(Marcouiller , 1997)，扩大了村民内部的收入差距(Kim et al. , 2005)。Oppermann (1996) 的调查和 Ribeiro (2002) 的实证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帮助不是很大；Blake et al. (2008) 也指出，在巴西，最低收入家庭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的好处的程度不如高收入家庭。

(二) 乡村旅游与质量型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质量涉及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创新能

力提升等(任保平,2013),对于乡村旅游发展而言,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贫困率下降、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在产业结构方面,乡村旅游能够促进农村产业非农化,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杨敏等,2006),但也容易造成产业结构单一、供给效率和品质低下等问题(林琼利,2018)。

在贫困率方面,Reeder et al.(2005)的描述性分析表明,乡村旅游与休闲业的发展导致低的地方贫困率以及其他社会条件的改善,如地方教育程度(loc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和健康水平(用死亡率来衡量);而Deller(2010)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对1990—2000年美国乡村贫困率的变化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旅游与休闲业在改变贫困率方面的作用很小,且空间差异也很小。

在生态环境方面,Frederick(1993)指出,与制造业相比,旅游业是清洁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影响较小,但是有可能造成地方自然环境的退化,对地方文化和习俗造成潜在侵蚀。首先,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农村地区不可避免地变得拥挤,导致土壤压实和侵蚀等物理性损害(physical damage);其次,拥挤导致建筑物越来越多,涉及住宿、吸引物、企业以及支撑设施等,这些发展会吸引更多的游客,使农村地区变得更加堵塞和拥挤,从而丧失乡土风味。此外,Unwin(1996)和Fleischer et al.(2000)的研究指出,乡村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并非简单的目标(结果)与手段(途径)关系。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将统领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并对乡村旅游和脱贫攻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认真审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内在逻辑,把握核心要点,识别关键路径,实现振兴蓝图。

(一) 因果逻辑

《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三个“必然要求”提纲挈领，道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原因和根本原因。

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来看，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的旅游业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旅游产业是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最重要的支撑之一，是人们获取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平台和路径之一（马耀峰，2017）。特别是在快速交通和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当下，旅游产业成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供给方和需求方甚至投资商和地方政府之间公平博弈的少有产业之一，能够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做出贡献。就乡村旅游而言，其淳朴的民风、宜人的风景、干净的空气等不仅是城镇居民对大自然的一种向往，也是当地村民对宜居环境的一种持续追求。然而，相比发达地方的乡村旅游而言，我国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面临资金紧缺、客源稀少、开发无序等更严峻更紧迫的问题，甚至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都在消失，乡村旅游失去了最核心的灵魂。由此可以看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能够解决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而乡村旅游又能反过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

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人民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是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的关键和难点都在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可以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脱贫攻坚工作，而脱贫攻坚则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和目标任务，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的相互关系如图 1 所示：

五大幸福产业是指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和养老产业，由李克强总理于 2016 年 6 月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首次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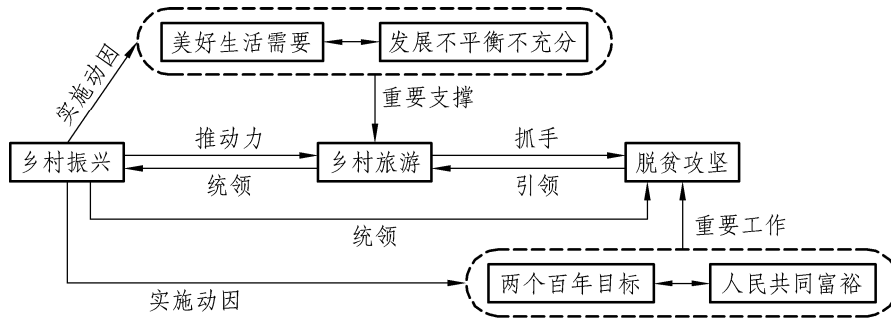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的相互关系图

（二）主体逻辑

《意见》明确指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之一，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这就表明，党和政府不是乡村振兴的实施主体，党和政府要摆正自己的角色，做好领导和管理的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就乡村旅游而言，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当地农民被边缘化，被排除在乡村旅游之外，无法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益处，致使其贫困状态无法得到改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不堪，因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对其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曹端波，2007）。对此，必须要扩大当地农民的参与度，确立农民在乡村旅游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唯有如此，乡村旅游的功效特别是在扶贫减贫中的作用才能得到真正体现。

就脱贫攻坚而言，脱贫扶贫减贫的对象自然是贫困人口，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扶贫脱贫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但最本质的还是自我脱贫，这就要求农民或贫困人口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可持续地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因此，脱贫攻坚的主体也是农民。也就是说，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和脱贫攻坚三者的主体具有统一性，均是农民，农民福祉的提升是三者共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实施逻辑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和脱贫攻坚如何开展、如何实施、如何落地？